

# 孫中山

## 政治思想研究

王德昭 著

商務印書館

# 孫中山

王德昭 著

## 政治思想研究

商務印書館

# 孫中山政治思想研究

作者： 王德昭

責任編輯： 陳穎賢

封面設計： 張毅

出版：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三號東滙廣場八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三字樓

印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安業街三號新藝工業大廈（六字）樓G及H座

版次： 二〇一一年六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2011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78 962 07 5585 9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 導 讀

陳萬雄

學術著作，有風行一時，漸因時代遷移而受淘汰，永失其價值者；有因研究扎實，根深葉茂，立論嚴謹而有不易的卓見，歷久常新，可傳之久遠者。先師王德昭教授舊著《孫中山政治思想研究》（原名《國父革命思想研究》，一九六二年在臺灣由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當屬後者。

近日發興比較孫中山先生與土耳其國父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土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 1881-1938）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功業，重讀了王師該著作。王師該書在學期間，或日後做研究工作，已讀過不知多少遍。近二十年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孫中山研究」一直是熱門課題，出版過的著作和論文千百計，其中不乏推陳出新的研究成果。今次重讀王師該著作，仍感其研究進路，獨樹一幟，為當今孫中山研究所闕。書中勝義紛陳，於我啓發仍多，有後撰者不可取代的參考價值。該種感受，諳於辛亥革命和孫中山研究的海外學者，屢有同感。

王師該著作的最初出版，囿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的時艱和書業運作的落後，本就流通不廣，只傳讀於當時的孫中山研究者之間。初版也早絕跡於書市，後之研讀者實無法得睹。八十年代中文圖書出版突飛猛進，而王師已歸道山，亦無從修定以應學術文化界的需要。今逢辛亥革命一百週年紀念，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將引動研究者的關心與讀者的興趣。相信王師該久已絕版的《國父革命思想研究》一書如能重新出版以廣流播，將大有益於對孫中山思想和辛亥革命的認識。故此推薦給香港商務印書館，並請得高壽而寓居於美國的師母王陳琬女士的同意，重排出版。

《孫中山政治思想研究》其撰作之緣起以至出版過程，王師〈自序〉中已有言及，此處不贅。此書結構如目錄所示，由兩篇長論文組成。一是〈同盟會時期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分析研究〉；一是〈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分析研究〉。前者是研究分析孫中山早期的革命思想的發展；後者是研究分析孫中山思想形成後的思想系統和特點。兩者相輔相成，互為補足。全面揭示了孫中山思想的中外來源、發展過程、內容要點、理論系統、時代特徵以至實行的成效等，是一本研究孫中山革命思想體大思精之作。

牟潤孫師在悼亡德昭師文中，曾道及德昭師為學特點，說他「中西史學兼通，既擅長西洋史更能講近代史，講中西交通史與史學方法論尤為出色……他治學不故為新奇之論，更不以異說嘩眾取寵，平正而翔實，頗為難得。」（見《海遺叢稿》〈悼亡友王德昭〉，北京中華書

局，二〇〇九年）牟師所說，切中肯綮，知人知言。《孫中山政治思想研究》充分表現了德昭師的治學所長和治學特色了。

孫中山一生，手不釋卷，博覽中外古今羣書，擷取革命和治國思想精華而融會貫通之。孫中山先生成長和革命活動蹤跡遍及中外各地，默察時世，體察人情，有實際的體驗。孫中山先生一身而預大小實際革命的組織和策劃，理論與實踐並重。所以創就了他自成系統、成一家之言並孚時用的革命和建國思想。要將孫中山思想組成，追本溯源，發展脈絡，邏輯理路，以及照應時勢所作的取捨，作草蛇灰線的疏理，談何容易。非兼通古今中外思想學說，諳於近代中外歷史形勢和史實，掌握有關孫中山行事的大量史料，予以疏理而不為功。近代孫中山研究者能具備如此種種條件者，德昭師足矣，所以能成就此體大思精、鞭闢入裏之作。

際此辛亥革命一百週年紀念與德昭師去世三十年的時候，能重排出版《孫中山政治思想研究》，俾流通士林，廣益孫中山先生和近代中國史的研究，公器私誼兼得，故不揣淺陋，略作導讀說明。

# 自序

本書所收的兩篇論文是作者應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遠東暨俄國研究所 (Far Eastern and Russian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之約，得其資助，於民國四十七年至四十九年間撰成。承該所梅谷博士 (Dr. Franz Michael) 函知作者有自由予以發表之權，承國防研究院張主任曉峰先生允為印行，都令作者感激不盡。

這兩篇論文所用的資料，大部分得自現在臺灣南投草屯的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史庫。該會典藏處同仁，在張處長大軍和李專門委員振寬的領導下，不辭辛勞，協助會外人士進行研究工作，其精神令人敬佩。至於這兩篇論文的主旨，作者不自量力，試圖就民元前後的政治、社會、與時代思潮的背景，以分析 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構成、其合理性及其有效性。這是一項純客觀的分析剖述的工作。但作者不揣淺陋，仍竊願於 中山先生遺教的闡揚，能有微末的貢獻。

王德昭 一九六二年三月

臺灣師範大學，臺北

# 目錄

導讀·····	陳萬雄	i
自序·····	王德昭	iv
同盟會時期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分析研究（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二一年）·····		1
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分析研究（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一九）·····		147



同盟會時期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分析研究

(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一年)

## （一）

同盟會時期是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大成的時期，也是他開始具有信念，相信革命的大業可以及其身而成的時期。<sup>1</sup> 在這時期中，他發表了三民主義學說的綱領，開始討論五權憲法，並擬具了一個層次井然的革命進行的程序，以後習稱「革命方略」。<sup>2</sup>

中山先生的言論，屬於同盟會時期以前的，傳世不多。<sup>3</sup> 但就現存可見的如「上李鴻章書」<sup>4</sup>、宮崎寅藏在《三十三年の夢》中的記載<sup>5</sup>、和興中會的宣言<sup>6</sup>等視之，與同盟會時期都還有前後相承的條理可尋。

1 「孫文學說」，《國父全集》（二），頁八八。一九五七年改版，臺北。「孫文學說」於一九一九年始在上海印行；有自序，一九一八年撰。

2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二十七章「革命方略」，載「軍政府宣言」等文告規程十三件。章

首說明「革命方略」的由來稱，「革命方略」，乃「丙午年（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東京同盟會本部所編制，為一種之油印品。……及中山自日本赴越南，革命軍之大本營遂移於東京河內，同時復將原稿重行修訂焉。……茲編所載，即河內機關部所修訂之油印品也，照錄全文如左。（馮書（一），頁二一三。一九五四年，臺北。）內「軍政府宣言」定革命建國的「措施之序」為三期，第一期為「軍法之治」，第二期為「約法之治」，第三期為「憲法之治」。（馮書（一），頁二一六；《國父全集》（四），頁六〇—六一。）但中山先生屢稱他制訂「革命方略」，規定革命進行的時期為（一）軍政時期，「在此時期內施行軍法；」（二）訓政時期，「在此時期內施行約法；」（三）憲政時期，「在此時期始施行憲法。」（《孫文學說》，《國父全集》（二），頁五四—五五。）其他革命黨人的記載，如胡漢民自傳，亦稱同盟會時期「先生更為『革命方略』，以授黨人，大旨分為軍政時期，訓政時期，憲政時期。」（革命文獻（三），總頁三九二。一九五三年，臺北。）因此，中山先生學說中的「革命方略」，在一般應用上，每專指他的革命建國三時期的主張，本文亦同此。

3 同盟會時期以前的中山先生言論，其傳世之稀，於下引吳稚暉的話可見。在致邵飄萍的一封信中，吳說，「中山先生的遺著，最近二十年來所存的，自然大家都看見。惟有他早年的言論，止有他的自傳裏講了一點，也還是他到了晚年的回憶的，並沒有長篇大論，確然是當時寫出的。現在幸虧有顧頡剛先生，得了陳援庵先生的指告，才在甲午年（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九月和十月的萬國公報上，錄了一篇上給李鴻章的信，介紹到十九期的語絲雜誌。這真是一個古董。」（吳稚暉言行錄，頁一三三。一九二九年，上海。此致邵飄萍書撰於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山先生逝世後半月。）

4 關於中山先生「上李鴻章書」的發現經過，已見上註。關於此書的撰成經過，則頗有異說。據陳少白說，此書在中山先生草成後，曾經陳自己和前太平天國的狀元王韜修正。（見《興中會革命史要》，

頁七—八。一九五六年臺版。臺北）因為中山先生與王韜相識是在鄭官應的上海家，鄭是《盛世危言》的著者，似乎其中應該也有鄭參加的成分。另據羅家倫說：「據胡汝麟（字石青，河南人，舊國會議員，雖與梁任公方面接近，但其人頗讀書，人品頗好，不妄語）告郭廷以……云，總理「上李鴻章書」，係麥孟華所草擬，總理與麥相稔，此係徐勤告胡者。」（羅氏毛筆原件，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存。）惟此書係以孫文署名發表，西字報至遲於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即已道及此書（見 Bernard Martin 著 *Strange Vigour: A Biography of Sun Yat-sen*, P. 53. 引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三日香港 China Mail 語。Bernard Martin 書，一九四四年，倫敦出版），而書中所見的思想，與同盟會時期中山先生的言論都還有前後相承的條理可尋，所以本文仍視此書為中山先生著作的一部分。與此問題有關者，尚有《盛世危言》各篇文字的撰人問題。早在同盟會成立之前，上海《國民日日報》論《盛世危言》，即稱：「按《盛世危言》一書，為皖人吳漢濤所撰。吳昔與孫逸仙交，其書半皆成於孫。後吳應鄭（官應）之請，故執其說以售之，獲多金。」（《國民日日報彙編》第三集，「社說」，「近四十年世風之變遷」，頁三四。光緒三十年，上海。）此不知何據。惟《盛世危言》自序和內容的「農功」一篇，其思想文字，多與「上李鴻章書」相似。參看胡秋原撰「鄭觀應及其《盛世危言》」一文（《三民主義半月刊》第四卷第十一號，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重慶。）胡氏並試作解釋，謂「鄙意先生（中山）與鄭氏年齡相差，至少有二十餘歲，然同縣（香山），且為同具新思想之人，必先生甲午去國前過從甚密，有討論之雅，有文字之交」云。

## 5

宮崎寅藏《三十三年の夢》，有中山先生壬寅年序，宮崎明治三十五年自序。按日本明治三十五年，歲次壬寅，應即是此書撰成之年，時在清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又宮崎記與中山先生談話，中山先生為他道革命的宗旨與方法，乃中山先生倫敦蒙難後次年經美洲返抵日本之年，歲次丁酉，即清

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

6 興中會宣言有二：一為甲午檀香山興中會成立宣言，一為乙未（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香港興中會宣言。（《國父全集》（四），頁五五—五九。）

## （二）

討論同盟會時期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最適當的年代的斷限，應該是起自癸卯（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這一年中山先生開始以其後同盟會的誓詞——「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來吸收革命黨員；而止於辛亥（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這一年武昌起義，中山先生自美國經歐洲返華，被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在庚子（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惠州之役失敗的當年，興中會的一個首領楊衢雲在香港被害。次年，又一個首領鄭士良病故。至此，興中會實際殆已陷於停頓的狀態。<sup>1</sup> 庚子以後，中山先生已極少為興中會收攬黨員；而尤可注意的，自庚子以後的幾年，中山先生在日本結識的中國留學界人士，他都未勸使加入興中會。<sup>2</sup> 癸卯，他曾應胡毅生等人之請，在東京組織了一個秘密的軍事訓練團體；<sup>3</sup> 乙巳（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他由美去歐，在留歐的中國學生中組織革命團體，<sup>4</sup> 都未用興中會名義。而反之，這兩種團體，乃至癸卯他在檀香山以興中會名義收得的革命黨員曾長福、黎協等人，所用

的誓詞都已是其後同盟會的誓詞。<sup>5</sup> 甲辰（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他去美，倡議洪門會員總註冊，並手訂「致公堂新章」，其所揭的宗旨也與同盟會誓詞的文字全同。<sup>6</sup>

惠州舉兵，後於戊戌（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康、梁的變法運動二年，後於康、梁在日本組保皇會（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一年。這次舉的失敗，可說興中會以會黨為主力起事的最後試驗的失敗。從庚子到癸卯的四年間，革命運動的國內外環境，有兩個顯著的變化：第一是興中會從甲午（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以來在會黨和海外華僑社會的基礎，幾乎十九被保皇黨所奪；第二是這幾年國內外中國知識青年對於政治運動的熱中。就前者言，中山先生自己承認，在他經過從乙未（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初敗至庚子革命進行最艱難困苦的五年後，適有保皇黨發生，「當此之時，革命前途，黑暗無似，希望幾絕。」<sup>7</sup> 在日本，興中會的根據地是橫濱。丁酉（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戊戌間康有為的弟子徐勤等至橫濱辦大同學校，最先向橫濱華僑社會為之先容的，也是興中會會員陳少白。<sup>8</sup> 但徐勤至日本年餘，而橫濱的孫、康兩黨，「已漸成反客為主之局。」及至戊戌事變起後，康、梁師徒亡命日本，梁啓超在橫濱發刊清議報，倡勤王之說。己亥（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橫濱保皇會成立，僑商中的興中會會員，更泰半加入保皇黨。<sup>9</sup> 在庚子興中會惠州舉兵的當年，在長江一帶便先有唐才常和秦力山等人主其事的自立軍之役，假勤王名義，受保皇會的經濟接濟，而所用的會黨基礎也即是畢永年為興中會所招致的長江哥老

會頭目。<sup>10</sup>在日本和內地保皇會的侵奪興中會地盤者如此，在興中會的發祥地檀香山亦然。梁啓超在己亥年終去檀香山，因中山先生的介紹與舊興中會會員交遊，於是立保皇會，而「檀島興中會會員也多為保皇會所用，與橫濱興中會會員如出一轍。」<sup>11</sup>梁啓超當日致書康有為，報告檀島保皇會事，便曾自稱「此間保皇會得力之人，大半皆中山舊黨。」又稱，「此間人無論其入興中會與否，亦皆與中山有交。」<sup>12</sup>而保皇會仍能使檀島華僑入會，至於「十人而七」。<sup>13</sup>至於南洋，則保皇會勢力的進入，尚在革命黨之先。

庚子後興中會意態的蕭條，可以從更多當時人的記述中見之。章炳麟自稱他在壬寅（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春天到日本，見到中山先生。但「那時留學諸公在中山那邊往來，可稱志同道合的，不過一、二個人。其餘偶然來往的，總是覺得中山奇怪，要來看古董，並沒有熱心救漢的心思。」<sup>14</sup>宋教仁《記程家禔事略》，也說程當時去日本，訪中山先生，初意「孫文革命首魁，所黨必眾，」豈料「所謂興中會，以康有為之煽惑，率已脫入保皇黨。孫文惟借張能之、溫秉臣、尤列、廖翼朋者數人，設中和堂於橫濱，其勢甚微。」並說當時「東京留學不過二百人，無有知革命之事者，惟言維新而已。」<sup>15</sup>興中會原來的基礎既為保皇會所奪，則革命的進行，除非奪回舊基礎，便須另造一新的基礎。張繼在壬寅年（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居日本，由秦力山帶領至橫濱謁見中山先生，中山先生沒有勸他和同去的人等入興中會，據張的解釋，大概中山先生「那時已經在計畫着把這以會黨為中心的



興中會，改組為以知識分子為中心的同盟會。」<sup>16</sup>

中山先生嘗自稱，「往年提倡民族主義，應而和之者，特會黨中人耳。」<sup>17</sup>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運動與會黨關係的密切，自不待言。在同盟會成立前二年（即癸卯），中山先生為便於在海外號召，並與美洲的保皇會勢力鬥爭，曾在檀香山親身加入洪門。<sup>18</sup> 次年，中山先生去美洲，倡議洪門會員總註冊，並手訂「致公黨新章」。「新章」的綱領第二條宗旨，與其後同盟會的誓詞文字全同，已如上述。而其綱領第四條，規定「凡國人所立各會黨，其宗旨與本堂相同者，本堂當認作益友，互相提攜，」<sup>19</sup> 也與其後「同盟會總章」的第五條，在精神和文字上聲氣相應。後者稱，「凡國人所立各會黨，其宗旨與本會相同，願聯為一體者，概認為同盟會會員。」<sup>20</sup> 迨辛亥年，中山先生再去美國，得知廣州起義失敗的消息，因赴舊金山，組織洪門籌餉局，以備再舉。當時同盟會和致公堂並曾登報佈告，由致公總堂開特別會，招納同盟會會員之未加入洪門者，全體入會。<sup>21</sup> 在致公總堂的佈告中，並明言「孫文大哥……倡義興同盟合聯會，結大團體，匡扶革命事業。」<sup>22</sup> 至於同盟會時期歷次在國內的武裝起義，下層自然仍都有會黨的成分參加。<sup>23</sup> 但如一位同盟會的日本同志荻野長知所說，會黨中人，「起事時求其響應固可，而欲用以為主力則不可，」<sup>24</sup> 因為他們知識淺薄，團體散漫。革命所得自海外華僑的效力，在勢祇能以經濟的接濟為主；至於國內會黨之直接參加起義，其效果亦殊有限。